

加快建设现代金融 服务高质量发展

■ 杨国民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不仅需要通
过服务实体经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实现高
质量发展,更需要通过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发
挥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金融,需要回归
本职,优化结构;需要强化监管,防控风险;需
要着力推动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需要加快
金融业改革。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围绕金融如何更好地
服务实体经济,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认为服务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职和责任,服务实体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金融业的使命。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与现代金融相辅相成。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不仅需要通过服
务实体经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

发展,更需要通过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其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说,加快建设现代金融,
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实体经济实现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已成为摆在金融业
面前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建设现代金融,需要回归本职,优化结构。
金融业只有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才能实现自身持续健康发展。一段
时间以来,一些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脱实向虚、
体内循环,不仅大大增加了融资成本,损害了
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给金融业带来了巨大
的风险。统计显示,2016 年底我国金融业增
加值占 GDP 的 8.4%,比重超过美国、日本等
多数发达国家。对于金融业来说,迫切需要根
植实体、回归本位,从服务实体经济中实现持

续、高质量发

展。在优化结构方面,需更好发挥金融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提升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完善金融产品体
系,大力压缩对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有序退出
“僵尸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通道业
务和融资中间环节,促进银企直接对接,精准
服务。特别是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加
大对新兴产业、民生事业、乡村振兴等领域
定向金融扶持。

建设现代金融,需要强化监管,防控风险。
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金融监管部
门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头等大事,亮出
监管“牙齿”,从规范交叉金融产品、整治违
法违规业务、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清理规范金

融控股公司等方面入手,深入整治市场乱象,
金融业“脱实向虚”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金
融体系风险防范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一些
领域风险隐患仍然不容忽视,打好防控金融
风险攻坚战还任重道远。

建设现代金融,需要着力推动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当前,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
应用,降低了服务成本,提升了服务效率和服务
体验,提高了金融服务覆盖度,正在对金融市
场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是,当前仍然
需要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基础上,推动金融与
科技相互融合,创新金融业务模式、完善金
融业务流程和推出新的金融产品,让科技成
为现代金融发展的“助推器”。

建设现代金融,需要加快金融业改革。改

革是建设现代金融的核心动力。从高质量发
展指标体系建设、金融业务创新到转型升级,
从加强监管、防控风险、回归本源,到形成金
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
部的良性循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一
系列艰巨任务。

《政府工作报告》对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出了明确部署,人大通
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将组建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监管银行业和保
险业,将逐步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
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同
时,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补齐监管“短板”,以
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将
获得充沛动力和保障,进而为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

■ 李云 李银娟 陈多多



综合学术界
近年来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学
者认为目前中国主流的经济学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主要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生产
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一般采用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进行研究,主张以理论创新
为基础指导中国发展,同时认
为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中主要存在单一
化、未精细化、理论体系不成熟等
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
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他在 2014 年 7 月
8 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在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强调,要立足于我国的
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 2015 年 12 月
21 日的中央工作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这是在中央层面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该理论的提出,是
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
一次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理论
价值。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习近平同志的要求,
涌现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梳理了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概况,并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尚
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以期为推进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习研究与
指导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学科定位

1、不同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理论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南开大学周立群定义政治经济学为这样一门学科: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探索生产关系、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从中得到揭示经济现象的思想方法。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杨承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基本经济制度、新常态与新理念、整体经济学与治国理政以及新时代世界经济。结合学者们对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定义,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反映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规律,并对其的经验总结。

实践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内涵。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角度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凭空产生。郝全洪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和客观规律,并且将实践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张占斌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使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实践角度出发去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可以将其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现阶段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指导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对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从二者共性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刘伟认为,任何时期的任何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其根本属性都是为其所代表的阶级谋求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从二者个性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和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翔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其的继承与发展,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普遍性体现在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殊性是指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的是我国人民大众根本利益,满足的是人民大众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定。

综上观点,从理论、实践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相适应,代表我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经验总结,其目的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邱海平指出一些人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熟视无睹,对于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而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如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反而在高校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周文认为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中照搬西方理论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原有的标志性特色经济理论被淡化甚至放弃,这种现象会给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下一代成长带来误导。但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郝全洪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比,具有中国特色。高帆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主流经济学具有四个特性:一是基于社会实践秉持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审慎态度;二是注重生产关系或制度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作用;三是从生产、流通、分配等维度出发系统理解经济运行过程;四是立足于多数社会成员的福祉改进来界定经济发展目标。周文指出,经济中心决定着经济的中心,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一个大国经济学。他认为,到 2030 年左右,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中心、经济学中心以及经济学研究中心均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因此,21 世纪的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迈向新阶段,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表现是非常态的,且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理论上,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繁荣有其历史原因,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日趋完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理论上的自觉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主流经济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重大原则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王朝科认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而科学有效指导我们理解、把握和落实这一理论命题。蔡继明、靳卫萍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科学抽象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法、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必然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二是坚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唯物史观。刘伟认为,在新常态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以及马克思历史观的要求。洪银兴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坚持的方法论。

坚持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我们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

及话语体系中,还应该与时俱进,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方法。杨承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要特别尊重运用辩证法,也要突出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研究、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高帆指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综合采用数理分析、计量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多种方法。

综合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看法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对一些具体研究方法进行探讨,认为应该借鉴学习西方经济学中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此外,2016 年 5 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任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时,首先谈到了继承性,也谈到要求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各方面资源,并批评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的错误认识。因此,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为指导,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有益成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5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也再次强调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进行了广泛而充分的探讨。

沈开艳从经济制度、经济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个方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一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任务和原则相一致;二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相一致;三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相一致。赵锦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坚持的四个原则,一要集中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二要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重大原则;三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西方经济学;四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张雷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主要有五个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王立胜则提出,需要坚持六个重大原则: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二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的发展理念;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程恩富更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

则。

尽管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问题众说纷纭,但一些基本共识也达成了一致,如立足中国国情、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等。实际上,我们也要在遵循总结、概括、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那么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原则也必须是服务于“新时代”,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立足我国实际,回应现实需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路径与发展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路径。习近平同志在 2015 年 11 月主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在目标任务上有三个方面的创新发展:一是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成了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二是在先富后富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建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三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升人民的全面素质,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供一个资源。其次,由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时代与现代的发展存在巨大差别,还有马克思理论并没有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具体规划,因此中国就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经济制度理论创新。最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遵循了经济发展规律,有相应的经济发展理论创新。

高帆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结构转换的新常态下,在这种经济情形下,中国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有创新,而这一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可能路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某些理论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创新。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与时代发展相对应作出创新性实践,例如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扩展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三是综合不同经济学派的观点,汲取他们的优势从而形成新的综合理论体系。而中国的理论创新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第三种途径,因为这一途径最有可能对当代中国实践形成最大的贡献。王伟光指出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四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创新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六大重大原则;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经济新常态理论,当前中国正在实现经济转型,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效率型增长,国家动力也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即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是中国经济发展要进入新常态就必须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下转 A4 版)